

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

李鈞鵬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將社會機制看作社會科學哲學的一種新理路，通過對社會科學哲學以及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經驗研究進行梳理和比較，歸納出社會機制的五項基本特徵：社會機制是一種解釋手段；社會機制是一種因果機制；社會機制與因果律相對立；社會機制具有不同的層次；社會機制具有時序性。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和方法取向，社會機制對傳統的社會科學哲學範式提出了挑戰，且正在影響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未來走向。

社會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已經成為當代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最為重要的分支之一。儘管學術界就社會科學哲學的定義和研究對象尚未取得一致意見，¹ 一項共識是：作為一種元理論 (meta-theoretical) 探究，社會科學哲學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本身的哲學思考。當然，這種思考與反省在具體研究中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但長期佔據核心地位的研究問題是：某種或某一系列的理論、邏輯或方法是否能夠或最好地解釋社會現象？這種判斷的邏輯基礎是什麼？近十年來，社會科學哲學取得了迅猛的進展，而成果最為豐富的當屬對社會機制 (social mechanisms) 的研究。對社會機制的關注早已有之，儘管未必使用相關術語，但一直到20世紀晚期，社會機制才作為一項系統的研究課題浮出水面。而在過去的短短的十年間，“社會機制”已經成為哲學與社會科學中最為常見的術語之一，甚至有學者將這一現象描述為一場橫掃社會科學與社會科學哲學的“機制運動” (mechanism



movement)。²遺憾的是，“社會機制”在中文學術界仍屬新生名詞，系統研究的匱乏更不待言。更為重要的是，即便在國際學術界，對社會機制概念的界定本身也遠未達成共識。本文試圖對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社會科學經驗研究進行解讀與梳理，結合社會科學哲學的相關理念，歸納出社會機制的最基本特徵。

一 作為解釋手段的社會機制

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是解釋社會現象。³⁻⁵儘管社會科學具有其他任務，例如觀察、描述、理解、闡釋和建言，⁶⁻¹⁰解釋(explanation)當屬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也是社會科學之所以成爲“科學”的精髓。

解釋由兩種成分構成：認識論(epistemology)與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又稱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主要關注知識的來源與形構過程。在社會科學中，認識論的重要性在於客觀事實與研究者主觀感受之間的平衡。在社會科學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兩種極端傾向：極端的歸納主義(inductivism)與主觀主義(subjectivism)。前者否認對社會現象作出理解與解釋的可能，而主張唯一可靠的知識來源是可觀察的事實；後者則頗爲類似宋明理學代表人物陸九淵¹¹和王守仁¹²所說的“心即理也”以及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Berkeley主張的“存在即爲被感知”(esse est percipi)¹³，認爲一個人自身的感受和意識是其唯一可靠的知識來源。本體論的考察對象是實在(reality)或本體的性質以及本體的基本範疇。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主要體現在研究單位的選擇。具體而言，我們可以梳理出四種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取向：個人(individual)、整體(holism)、形勢(situation)與關係(relation)。以個人爲研究對象的本體選擇常稱爲方法論個人主



義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持這種取向的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終做出選擇並採取行動的是個人，而社會現象以及一切所謂“整體”或“結構”都只不過是個體的累加，從而正確的研究方法是將研究單位層層化約至個人，從個體入手來解釋整體現象。新古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和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多持這種取向。以整體為對象的本體選擇認為，不同層次的社會結構或現象有其自身的行動邏輯，而這種邏輯往往能夠自我維繫、自我解釋。傳統政治學對“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¹⁴以及政治學家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¹⁵可以被看作這種取向的代表。以形勢為對象的本體選擇認為，只有事件或互動所發生的形勢、情形或個人意識才是真正穩定的、不可化約的研究單位。許多心理學研究、社會學中的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及受現象學(phenomenology)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哲學影響的社會科學研究¹⁶持這種觀點。以關係為研究對象的本體選擇則把目光轉向個人與群體所佔據的社會位置以及不同位置之間的關係。社會網路分析可以看作是這種取向的最佳代表。

作為一種解釋手段，社會機制試圖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維持平衡，避免滑入任何一個極端。在認識論上，社會機制尋求發掘社會現象背後的可以驗證、可以觀測的事實，並構建它們之間的聯繫；同時認識到，一個事實或一種結構並不足以引致相應的社會現象，從而主體施為(agency)背後的認知(cognition)與動機(motivation)必須得到分析。以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為例。1970年代至今，抗爭政治研究一直為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理論所主導。在這種理論看來，對自身狀況的不滿與悲憤感以及對某些社會現象、結構或個人的憎惡感普遍存在，但相對而言，人們並不總是訴諸抗爭行動。從而，集體政治行動的最重要因素是作為外生因素的政治契機(political opportunity)或政治契機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具體而言，政治過程



理論認為，抗爭政治的動員或升級取決於以下先決條件中的任何一條：第一，抗爭群體具有一定的管道以接近政治權威；第二，抗爭群體受到某些政治權威的同情，甚至支持；第三，政治權威對抗爭群體的鎮壓傾向或行動正在減弱；第四，政治權威處於分裂狀態；第五，國際或國內的政治氣候足夠成熟。政治過程理論引領了諸多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尋找抗爭政治產生、成功或失敗背後的結構性因素。¹⁷⁻¹⁸ 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這種理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¹⁹ 其中兩項關鍵質疑是：第一，對政治契機的列舉只是一種事後的倒推，其隱含邏輯是，抗爭政治之所以爆發或成功，原因在於適宜的政治契機，而其原因與後果實際上是同一回事，從而具有循環論證或套套邏輯的嫌疑；第二，對政治契機的定義集中於客觀結構，但抗爭政治的參與者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未必能意識到這些契機的存在，或者，參與者意識到了契機的存在，但這可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錯誤知覺，從而，真正的研究重點應該是抗爭政治參與者的主觀意識與知覺，而不是客觀的結構因素。例如，社會學家Kurzban對1979年伊朗革命的研究闡明，伊朗革命爆發之前的客觀政治契機並不成熟，但參與者並不這麼認為，堅持發動革命並最終取得了成功。²⁰ 社會機制的研究視角試圖調和客觀與主觀因素之間的關係，拒絕只有結構化政治契機才是可靠的事實與知識來源以及抗爭政治的動員完全取決於參與者主觀感受這兩種極端觀點，而試圖理解（1）政治契機在什麼狀況下會轉化為主觀認知；（2）這種主觀認知反過來對政治契機有什麼影響；（3）在什麼狀況下主觀認知會轉化為抗爭政治行動；以及（4）在什麼情況下政治契機結構會導致抗爭政治的成功，什麼時候又導致其失敗。

在本體論上，社會機制承認個人、整體、形勢與關係作為研究單位各自的優勢，不將任何單元置於優先地位，而是根據研究



對象和問題進行綜合。以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成為例，不同的研究單位可以提供不同的創見。方法論個人主義考察個人意識的形成如何受到對個人效用最大化追求的驅動和制約，並將這一形成過程視為策略性選擇。整體主義挖掘一個社會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對知識份子個人意識的影響。以形勢為研究單位，我們可以分析知識份子的自我概念如何受不同事件的驅動，以及與他人的社會互動過程對個人觀點的塑造。對關係的考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階級關係或社會網路在知識份子意識形成過程中的角色。社會機制視角認識到，上述視角都具有其獨有的解釋力，但其本身都無法提供全面的圖景，而我們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必須對假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單位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如 Tilly 所言：“社會分析者經常得出錯誤的結論，其原因在於：他們往往對社會系統這樣的基本實體作出假定，而不對這些實體本身進行探究。”²¹ 圖1展示了社會機制視角對知識份子意識形成的解釋。可以看到，從社會機制的角度出發，我們就能夠對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成作從宏觀結構到微觀互動的多重層次的系統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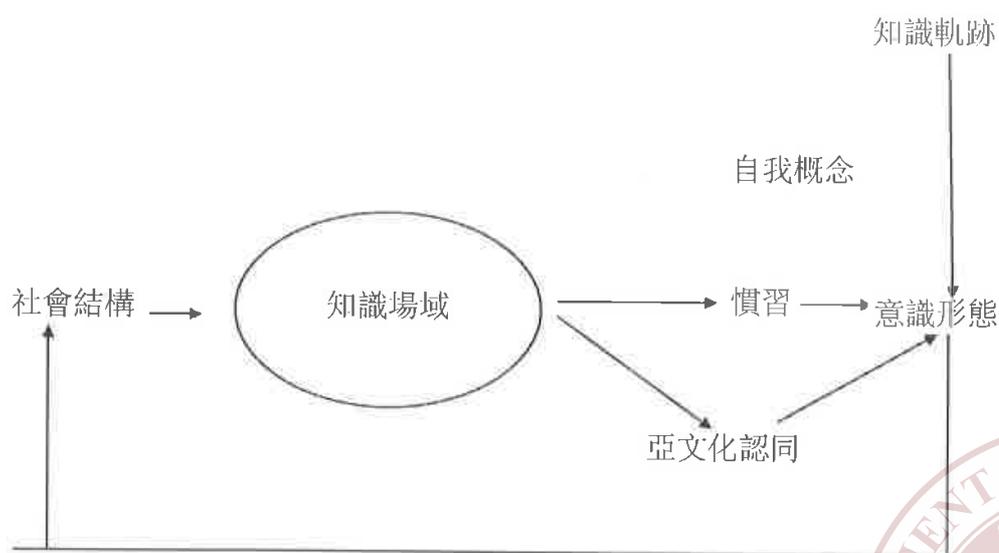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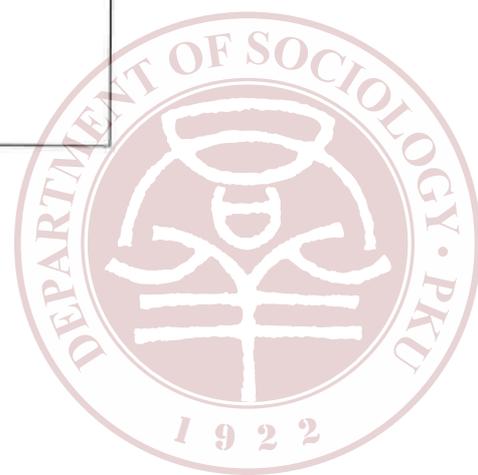


圖1：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成



二 作為因果機制的社會機制

儘管存在不同意見，²² 大部分社會科學哲學家都贊同，作為一種解釋手段，社會機制理路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建立起因果聯繫 (causality)。當然，不同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因果聯繫的建立並不似表面上那麼容易。例如，在統計分析中，社會科學家常常避免因果性語言，而停留在對兩個變數之間相關度的檢測。另外，對一個社會現象的解釋並不只是尋求它所發生的原因。一個男孩在母親面前打碎了一個茶杯，他急忙解釋道：“我不是故意的！”這種解釋顯然不是社會科學的理路。Tilly 將解釋分為四種：慣例 (convention)、故事 (story)、準則 (code) 與技術性解釋 (technical account)。²³ 準則是普遍接受的，基於妥切性而非因果充分性的解釋。對打碎茶杯的“我不是故意的”這種解釋就是一種慣例。而當一個人上班遲到時，他可能會解釋道：“不知為什麼，地鐵1號線今天不在我家那一站停。我只有先反方向坐三站，再折回來。地鐵開了一半，我忽然又發現文件忘帶了，……這樣來回路上多折騰了一個多小時。”這種理由是通過故事來建立因果聯繫。準則通過程式上的律法或準則來解釋某種行為或現象。例如，一個公司對開除某女性員工的解釋是其穿超短裙上班，而這違反了公司章程第5條第3項。社會科學家訴求的則是技術性解釋，它要求特定的知識與權威。

表1：解釋的四種形式

	通用	專業
慣用語	慣例	準則
因果解釋	故事	技術性解釋

來源：Charles Tilly, *W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



進一步細分，社會科學涉及三種解釋：實用解釋 (practical explanation)、語義解釋 (semantic explanation) 以及因果解釋 (causal explanation)。實用解釋是使得研究者或他人能夠對某一現象進行干涉的解釋。例如，在公共衛生研究中，研究者試圖解釋自閉症，而一旦找到了這種解釋，就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對自閉症進行治療。這種解釋在自然科學中非常常見，但在社會科學中屬於少數。語義解釋意味着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歸納與推理已經達到了其解釋力的邊界，亦即這種解釋已經處於不言自明的狀態，而無須再對這種解釋本身加以解釋。例如，大多數經濟學家假定人追求自利的天性，從而，“為什麼某個人遺落在大街上的一百元錢在十分鐘內不翼而飛”這個問題就可以以人的自利性加以解釋，而無須進一步闡明。因果解釋試圖發掘某個社會現象背後的邏輯結構，從而具有知識累積性。

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因果解釋是以一個（或一串）先發生的事件 (event) 或事實 (fact) 來解釋一個（或一串）後發生的事件或事實。²⁴⁻²⁷ 將事件與事實加以排列，我們可以梳理出四種因果解釋機制：(1) 事件—事件，即以一個先發事件解釋一個後發事件。例如，以《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來解釋五四運動的爆發。(2) 事實—事件，即以一個先定事實解釋一個後發事件。例如，以新思想的傳播與民族主義的高漲來解釋五四運動的爆發。(3) 事件—事實，即以一個先發事件解釋一個後續事實。例如，以五四運動的爆發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快速擴張。(4) 事實—事實，即以一個先定事實解釋一個後續事實。例如，以中國國民黨的腐敗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快速擴張。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可能是非事件 (nonevent) 或未發生事實，例如“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或“為什麼美國的信教者比率沒有顯著的下降”。這種問題實際上假定了一個比較對象（“科學和工業革命在近代西方社會發生”或“西歐的信教者比率有顯著的下降”）



或正向的決策制定（“大部分美國人仍然每週固定去教堂做禮拜”或“大部分美國人仍然自我認同為信教者”），從而可以相應地歸於上述類別之中。

三 對立于涵蓋律的社會機制

德國哲學家 Hempel 與 Oppenheim 提出，解釋的目的在於提供涵蓋律 (covering law)。²⁸⁻²⁹ 這種觀點得到了英國哲學家 Popper 的進一步闡述，³⁰ 從而也被稱為亨普爾-奧本海姆模型 (Hempel-Oppenheim model)、波普爾-亨普爾模型 (Popper-Hempel model) 或演繹一定律模型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 或簡稱為 D-N model)。

涵蓋律解釋模式主張，社會科學中的解釋是一種包含前提 (premise) 和結論 (conclusion) 的演繹形式：

$$\frac{C_1, C_2, \dots, C_k}{L_1, L_2, \dots, L_r} \\ E$$

作為“解釋項” (explanans), C_1, C_2, \dots, C_k 是對先定事件或事實的前提性陳述，又稱“初始狀況”。 L_1, L_2, \dots, L_r 是涵蓋律，這裏涵蓋律可以只有一項，也可能是一個系列。E 是被解釋的結論性事件或事實，或稱“被解釋項” (explanandum)，它是前提項的邏輯後果。最簡單的涵蓋律是以下三段論：

$$\frac{\text{如果 } a, \text{ 則 } b \text{ (涵蓋律)} \\ a \text{ (解釋項)}}{b \text{ (被解釋項)}}$$



一個更為複雜的涵蓋律模式是概率解釋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又稱歸納—統計模型 (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或簡稱為 I-S model)。在這種解釋模式中，涵蓋律並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普遍性，而其強度決定了解釋力的強度。我們同樣可以用三段論來加以表述：

$$\frac{\text{如果 } a, b \text{ 的概率很高 (涵蓋律)}}{\text{a (解釋項)}} \\ \hline \text{很可能 } b \text{ (被解釋項)}$$

上述兩種三段論具有類似的內在邏輯：對一個（或一串）事件或事實的解釋就是從被假定為真實的前提中演繹出結果。儘管接受程度有異，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涵蓋律思維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對涵蓋律的批評不時出現，社會科學哲學很長時間未能提出新的解決方案，³¹ 而這種情況一直到社會機制概念的成型才有所改觀。事實上，社會機制概念的出現可以被看成是對涵蓋律的直接挑戰。具體而言，這種挑戰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涵蓋律的邏輯出發點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本體論，將實在化約為事件與經驗觀察，從而因果關係成為可觀察事件或事實之間有規律的聯繫；第二，涵蓋律的解釋只是一種近似於規律性或統計性的關係，而並沒有指明真正的因果機制；第三，涵蓋律式的思維過分訴諸於歸納，並直接或間接地假定這種歸納適用於一切情況與事件；第四，涵蓋律給變化或差異 (variation) 留出了極小的空間。不同于涵蓋律，社會機制的目標要謙卑（或曰現實）許多，它只試圖提煉出特定時間或空間節點內的具有相對歸納性的機制；社會機制的因果性具有選擇性與局部性。我們不妨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比較涵蓋律解釋和社會機制解釋的區別：



每天堅持慢跑三十分鐘有助於減肥
我上個月堅持每天慢跑三十分鐘（涵蓋律解釋）

我這個月的體重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

不難發現，這種解釋存在下列問題：第一，我這個月的體重未必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第二；即使我這個月的體重有所減輕，它也不代表所有滿足和我一樣條件的人的體重會有所減輕；第三，它並沒有真正在涵蓋律和被解釋項之間建立起因果機制。

下面是一個社會機制解釋的例子：

慢跑有助於消耗體內多餘熱量，從而有助於減少體內脂肪，
從而每天堅持慢跑三十分鐘有助於減肥
我上個月堅持每天慢跑三十分鐘（社會機制解釋）

我這個月的體重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

這兩種解釋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建立起了因果機制，而前者只是在涵蓋律和被解釋項之間發現了關聯，因果機制卻並不真正存在。當然，後者並非沒有其問題，但因果機制並不宣稱其獨一性，換言之，它留出了完善和補充的空間，從而能夠為進一步的比較和知識累積奠定基礎。

再看一下社會機制在政治學中的應用。政治學的一個經典問題是經濟增長與民主政體之間的關係。受到傳統現代化(modernization)理論³²⁻³³的影響，許多政治學家（以及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直接的正向關係。³⁴⁻³⁵這種涵蓋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質疑與經驗挑戰，³⁶⁻³⁷而從社會機制的理路看來，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當然值得討論，後續研究也提供了精細得多的模型。但這裏的關鍵是，在暗含了因果關係的同時，涵蓋律並沒有真正解釋經濟增長影響政治制度的機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種相關的社會機制：(1) 經濟增長通過灌輸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來促進民主



政治；(2) 經濟增長通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來促進民主政治；(3) 經濟增長通過培養公民社會或中間組織來促進民主政治；(4) 經濟增長通過改變國家—社會關係來促進民主政治。³⁸

另一個例子是社會學中的參照群體 (reference group) 理論。參照群體理論源于社會心理學家 Mead 的“概化他者” (generalized other) 思想的影響，它告訴我們，人們經常評估自己所處的形勢，並基於一個用來比較的群體 (comparative collectivity) 形成自己的觀點。³⁹⁻⁴⁰ 問題在於，這種理論缺乏足夠的支撐機制，它未能告訴我們人們如何為他人的觀點所吸引，或者說，它無法解釋“在某一特定例子中，在何種條件下，誰尋求誰的影響，其判斷基於何種標準”。⁴¹ 以上文的知識份子為例，通過參照群體涵蓋律的修正，我們可以提出知識份子意識形成的下列社會機制：(1) 尋求意義與歸屬感是人類本性，而這主要是通過將知識份子自我置於社會群體中，並維繫這個團體的獨特的群體認同而得到滿足；(2) 知識份子群體通過劃分象徵性邊界來區分自我與他者，以此來構建和維繫群體認同；(3) 加入某個群體的個人選擇強化了知識份子的身份認同，而強化了的身份認同將賦予知識份子以更強烈的認知與行動動機；(4) 知識份子與知識份子群體基於與其他知識份子與群體的參照和比對來界定自己的思想與行動；(5) 參照群體包括類似的群體與對立的群體，前者作為正向參照群體強化知識份子的自我概念，而後者作為負向參照群體有兩種可能的後果——在知識份子的自我概念尚未成型時對其起弱化作用，在自我概念已經成型後起強化作用；(6) 知識份子群體與學派的多元化在量的方面減少了特定群體的人數，在質的方面卻強化了特定知識份子群體的身份認同與自我概念；(7) 知識份子之間的衝突與論戰往往會強化知識份子本已形成的思想與意識，並動員和增強成員的團結感。⁴²



四 多層次的社會機制

多數社會科學哲學家認為，社會機制所提供的是關於另一種（具有“高一級”的研究單位的）理論的（具有“低一級”的分析單位的）組成性過程的知識；⁴³ 它在避免“一切皆相關”的陷阱的同時，增強了高一級理論的精確性、複雜性以及優雅性。換句話說，社會機制先將分析對象的高階單元分解，然後分析低階單元的因果關係，最後將這種低階的多個因果關係合成為高階的因果關係 $X \rightarrow Y$ 。然而，關於社會機制的層次，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社會機制的內在邏輯要求方法論個人主義，⁴⁴⁻⁴⁶ 但更多的學者否認社會機制只能適用於個人層面的觀點。例如，在對集體行動與抗爭政治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指出，從社會關係到群體身份認同 (collective identity)，到參與者身份認同 (participation identity)，最終到加入集體行動，其中的社會機制涉及多個層次。⁴⁷⁻⁴⁸ 尤其是在從群體身份認同到參與者身份認同的轉換中，有三種社會機制在發生作用：短期關鍵事件、內在結構變動以及正式組織的推動。圖2展現了社會機制的多層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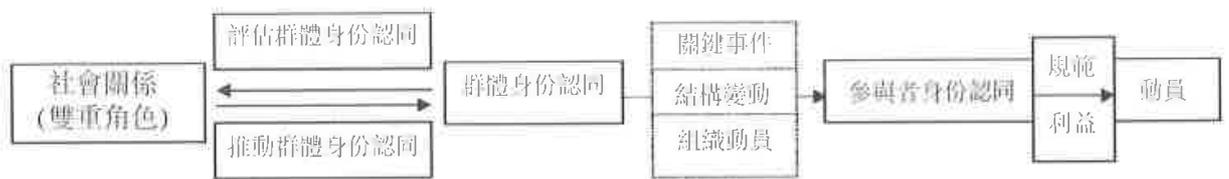


圖2：集體行動動員的社會機制

Tilly 對社會機制的不同層次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並區分了三個層次的社會機制：環境機制 (environmental mechanism)、認知機制 (cognitive mechanism) 以及關係機制 (relational mechanism)。環境機制是改變社會生活與政治過程的外部影響；認知機制是基於



個人與群體感知的變化；關係機制改變個人、群體與人際網路之間的關係與連接。⁴⁹⁻⁵¹

通過這種概念化，我們就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上討論社會機制。例如，社會學家 Goldstone 發現，早期歐洲與亞洲的現代農業—官僚 (agrarian-bureaucratic) 國家的解體都是由迅猛的人口增長促成的。例如，英格蘭的國家解體發生在 1640–1642 年，而在 1500–1650 年間，英格蘭人口從 2 百萬增至 5 百萬，倫敦人口則從 5 萬增至 40 萬。同時，Goldstone 避免了涵蓋律的陷阱，沒有強調人口變動與國家解體之間的線性關係，而是將人口增長與弱化了了的國家稅收能力與財務危機、精英競爭與民眾的動員聯繫在一起，提供了一個環境機制的典範。⁵²

關於認知機制，法學與行為科學家 Sunstein 的研究可以給我們不少啟發。Sunstein 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普通民眾會產生極端的想法，甚至付諸極端的行動？Sunstein 發現，極端現象往往發生在志同道合者之間產生互動時。為了進一步解釋這一現象，Sunstein 提供了一系列的認知機制，例如蹩腳認識論 (crippled epistemology)、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修辭優勢 (rhetorical advantage)、感情紐帶 (affective tie) 以及適得其反的更正 (self-defeating correction) 等。以蹩腳認識論為例，這種認知機制指出，儘管遠非不理性者，思維極端者常常不具有充分的資訊或知識，而他們腦中所貯存的知識往往支持其極端信念，或者他們有選擇性地獲取支持其極端信念的知識，而拋棄有衝突的證據。⁵³

Barkey 對奧斯曼帝國的研究則是一個關係機制的應用範例。Barkey 感興趣的問題是：奧斯曼帝國為什麼能夠長期延續？不同于傳統的歷史考察，Barkey 對連接持續變遷的宏觀結構片段的組織與網路進行了分析，集中考察了縱向與橫向的多重社會網路關聯，以及國家與社會行動者之間短期或長期的契約。以奧斯曼帝國的崛起為例，基於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行動與政治領袖的



自我中心網路 (ego networks) 的分析, Barkey 指出, 奧斯曼一世 (Osman I) 之所以能成爲一位建立並鞏固起近似于現代國家的政治結構的領袖, 既與他所處的橫向關係的性質有關, 也在於他串聯 (broker) 原先互不關聯的群體的能力。奧斯曼一世串起了許多潛在附屬群體的結構洞 (structural holes), 從而, 當他力圖鞏固自己的地位時, 他已經有了一個以他爲中心的, 由互相依賴的群體所組成的關係網絡。通過中層的關係機制, Barkey 巧妙地回答了一個宏觀歷史問題。⁵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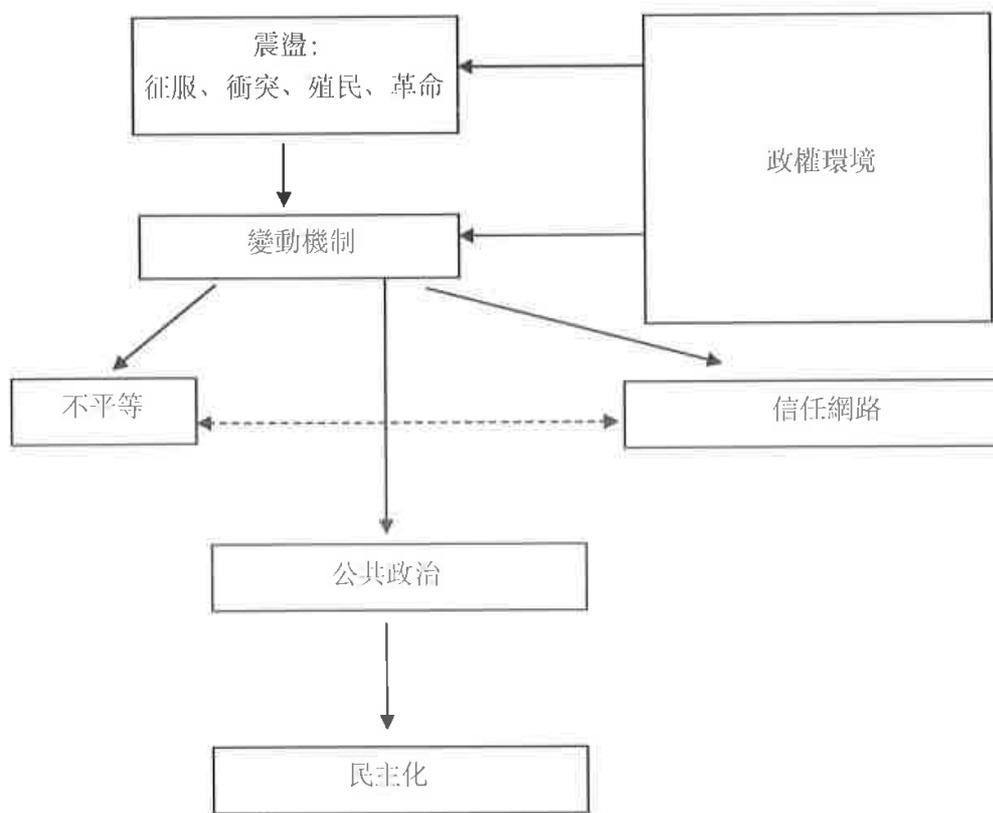


圖3: 民主化的因果序列

來源: Charles Tilly,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Paradigm, 2005), 37.

我們同樣可以將環境、認知與關係機制綜合起來解釋社會現象。Tilly 對民主化的研究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在圖3中, Tilly 描繪了民主化的因果序列。在 Tilly 看來, 民主化是三種相對獨立卻又



相互依賴的社會關係互動的後果：公共政治 (public politics)、類屬不平等 (categorical inequality) 與信任網路 (networks of trust)。簡言之，在民主化進程中，民眾對公共政治的公平參與權將受到保護，基於性別、種族、宗教等類別的不平等呈弱化趨勢，人際網路由對政府控制的規避轉向對政府機構與活動的介入。我們可以看出，公共政治屬於環境機制，信任網路屬於關係機制，類屬不平等則屬於關係機制與認知機制的結合。而在這每一種機制下面，Tilly 又羅列和分析了進一步細化的社會機制與過程。⁵⁵⁻⁵⁷

五 具有時序性的社會機制

如果我們將歷史學剔除在外，社會科學對待歷史的態度可謂一直是不冷不熱。儘管社會科學家從未完全忽略歷史學研究，並經常徵引後者，歷史學家對社會生活的時序性 (temporality) 的複雜的、多面性的理解甚少受到社會科學家的認真對待。⁵⁸⁻⁵⁹ 從表面上看，歷史在社會科學解釋中不乏一席之地。以涵蓋律解釋為例，歷史經常成為對範圍或範疇的界定（例如，“在中國人發明火藥之前，戰爭呈現 X 特徵”）；或成為一個抽象的變數（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以來”）。然而，社會科學家很少承認特定歷史事件與歷史過程的影響，更不用說對歷史進行概念上的梳理。⁶⁰ 而要對時序性進行分析，就必須將歷史過程分解為歷史事件。簡單說來，一個社會事件或事實引致了另一個社會事件或事實，前者與後者間必定有一個中間過程，而二者是不可能同時發生的；這一中間過程永遠嵌入于時序中。社會機制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具有時序性的歷史事件有其意義；它們在因果解釋中的地位不僅應該受到承認，而且應該加以進一步的概念化與分析。



另外，社會科學家普遍傾向於結構性思維，⁶¹⁻⁶²但在對社會結構的追求中，社會生活的時序性往往令人遺憾地受到了忽略。在主流社會科學研究中，“結構”被直接或間接地視為給定，視為決定了社會行動的堅實的社會事實或隱含的不變邏輯。問題在於，這種隱含的社會結構本身隨歷史時序的變化而發生轉變甚至變革。換言之，社會結構本身有其歷史。⁶³就此而言，社會機制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有意識地將時序性引入社會科學研究，並對其加以概念化的嘗試。

正如 Tilly 所說：“[基於社會機制的解釋]對歷史持熱烈歡迎的態度，因為其解釋理路將對總體性機制的尋求與[對歷史過程的認識]結合起來。[換言之，社會機制認識到]初始狀況、序列與不同機制的組合加在一起，構成了具有不規律但可以解釋的後果的過程。”⁶⁴社會機制解釋將總體性機制與“局部理論”⁶⁵⁻⁶⁷結合起來，從而能夠解釋初始狀況與相鄰過程(adjacent processes)如何引致獨特的歷史軌跡與社會結果。

政治學家 Bense 的研究闡明了特定歷史事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1896年夏天，美國民主黨人在芝加哥舉行全國集會，就競選綱領與總統候選人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最終採取了將銀加以貨幣化的競選綱領，並提名 Bryan 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這場充斥了激情與戲劇化的集會不僅對民主黨整個20世紀的發展軌跡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深刻地塑造了美國工業擴張的形態。⁶⁸而小事件同樣可以產生大影響。在2004年美國總統競選民主黨內的初選中，聲勢最盛的 Dean 的一聲尖叫（後人戲稱為“I have a scream”）不僅最終毀掉了他的總統夢，也間接幫助了小布希的連任。社會學家 Goldfarb 深刻地闡述了小範圍的社會互動如何影響大範圍的社會與政治變遷。⁶⁹事件之所以在社會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原因在於，正是通過事件的展開，我們才得以觀察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的碰撞。⁷⁰



Sewell區分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三種時序性概念：目的論時序性 (teleological temporality)、實驗性時序性 (experimental temporality) 以及事件性時序性 (eventful temporality)。⁷¹ 在目的論時序性看來，社會生活由超越歷史的線性法則所塑造，而Marx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一個經典範例。Sewell對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 (world-systems) 框架中的目的論時序性進行了剖析。Wallerstein的基本解釋邏輯是：地方社區的命運並不由（至少不主要由）地方事件決定，而是由具有體系性的全球轉變決定。在Sewell看來，一旦我們將在空間和時間上具有地方性的事件通過它們在全球整體中的位置來解釋，我們就落入了目的論時序性的陷阱。Wallerstein將資本主義後期的發展看成是其“大爆炸”後不可避免的軌跡，卻沒有意識到，與星球不同，人具有評估他所身處的社會結構的能力，而人與社會的互動是任何初始結構所無法預測的。Skocpol對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比較研究表現了實驗性時序性。Skocpol將她的三個歷史案例視為“自然實驗” (natural experiment)，並進行了細緻的比較，得出社會革命發生的三個必要條件：國家軍事落後、強有力的地主階級與相對自治的農民社群。然而，這種“自然實驗”要求她的三個案例具有同一性與獨立性。換言之，Skocpol必須假定，她所研究的三場社會革命具有同一的因果律，且早期的革命與後期的革命無關。但這並不符合現實，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階級、階級關係與政治制度，而這很可能會改變社會革命的必要與充分條件；而俄國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不僅如此，這種比較方法使她無法考察不同革命中的不同事件如何影響革命的進程與後果。最後，社會機制所採取的時序性屬於事件性時序性。後者認識到歷史進程與社會生活中的事件的重要性與因果解釋力。社會機制並不假定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獨立性，而認為它們具有路徑依賴性 (path dependence)。⁷² 事件在部分上通過改變塑造和約束社會行動的文化範疇而導致社會變遷，



而社會關係中的因果律至少在部分上依赖于文化範疇的內容與關係，從而，事件具有改變社會因果關係的能力。⁷³

政治學家 Beissinger 對蘇聯解體的分析是基於歷史事件的社會科學的經典例子。Beissinger 明確指出：“本項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抗爭事件。儘管遠非剖析抗爭的唯一手段，作為研究動員的波狀運動的手段，事件分析受到了廣泛的認可。究其本質，這種方法追溯特定事件類型的起落，以及與之相聯繫的特徵”。⁷⁴ Beissinger 搜集了從1987年1月到1992年12月的6,663場抗議遊行與2,177場大規模暴力事件的資訊，並通過對這些歷史事件的分析，展示了對蘇聯國內改革的政治要求如何引致一系列的抗爭事件，包括對區域自治與獨立的要求，並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這種研究方法與 Tilly 所宣導的基於機制的分析不謀而合，後者“挑選歷史片段的突出特徵，或片段之間的顯著差異，並通過確認出這些片段中具有相對總體性的穩定機制對其加以解釋”。⁷⁵

六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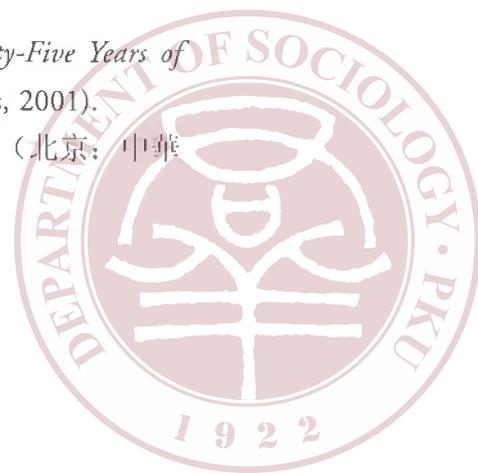
本文總結了社會機制的五項基本特徵。當然，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我們還可以進行進一步提煉，本文也不以窮盡社會機制的
所有維度為宗旨。但在筆者看來，上述特徵最為顯著，最具有根基性。而將它們綜合在一起，我們就相應得出社會機制的
基本定義：社會機制是與涵蓋律相對立的，具有時序性與不同層次的因果解釋手段。這個定義看似簡單，但筆者希望本文至少展示了社會機制的豐富內涵及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性。美國科學哲學家 Kuhn 曾經指出，科學的發展可以被視為不同理論與方法流派爭奪話語權的鬥爭，而且結果就是為一個科學共同體所共用的範式 (paradigm)。⁷⁶ 社會科學哲學可謂百花齊放，但真正具有範式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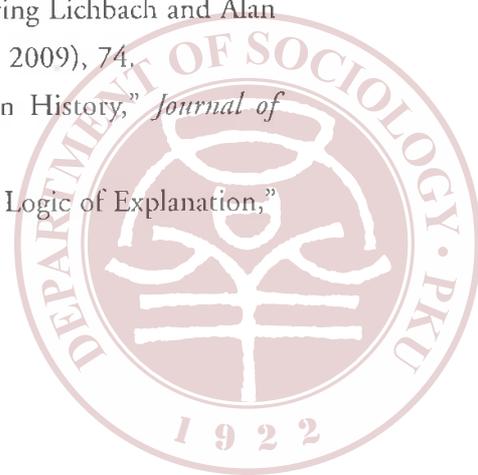
力的並不多見。社會機制在近十年來的蓬勃發展以及諸多學科社會科學家的應用，使得社會機制成為社會科學哲學中範式的當仁不讓的候選者。當然，作為一種形式化的 (formalized) 理路，社會機制仍屬新生事物，對它的探討也遠未達成一致。⁷⁷⁻⁸⁴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社會機制已經並將進一步影響社會科學家對其研究方法與理論的思考，而這種影響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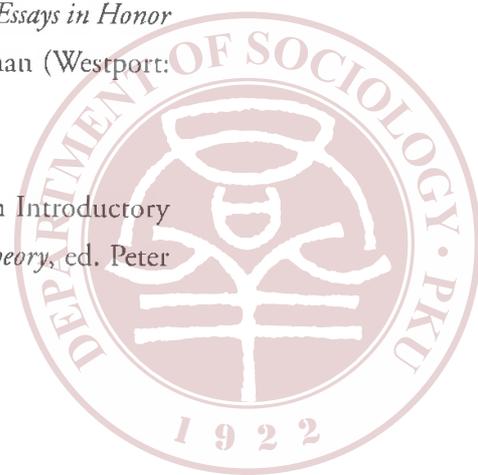
- 1 Stephen P. Turner and Paul A. Roth,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alden: Blackwell, 2003).
- 2 Zenonas Norkus, "Mechanisms as Miracle Makers? The Rise and Inconsistencies of the 'Mechanismic Approach' in Social Science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4 (2005), 348–372.
- 3 Andrew Abbott, *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
- 4 Berth Danermark, Mats Ekström, Liselotte Jakobsen, and Jan Ch. Karlsson, *Explaining Society: Critical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5 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Jerome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5).
- 7 Charles Kurzman, "Can Understanding Undermine Explanation? The Confused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2004), 328–351.
- 8 Peter T. Manicas, *A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9 Paul Rabinow and William M. Sullivan, ed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10 Joan W. Scott and Debra Keates, *Schools of Thought: 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陸九淵，〈與李宰二〉，載於《陸象山全集》，陸九淵著（北京：中華書局，199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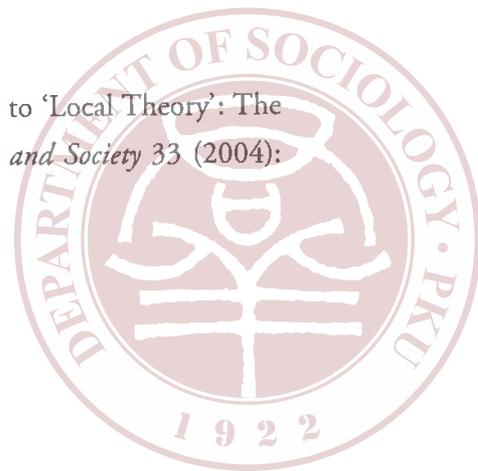
- 12 王陽明，〈徐愛錄〉，載於《傳習錄全譯》，王守仁著，於民雄注，顧久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6。
- 13 George Berkeley,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Chicago: Open Court, 1904), 31.
- 14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1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 16 Neil Gross, *Richard Rorty: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17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18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9 Jeff Goodwin and James M. Jasp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Structure, Meaning, and Emotion*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2004).
- 20 Charles Kurtzman, “Structural Opportunities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ies in Social-Movement Theory: Evidence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996), 153–170.
- 21 Charles Tilly, *Explaining Social Processes* (Boulder: Paradigm, 2008), 5–6.
- 22 Andrew Abbott, “The Causal Devolu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7 (1998), 148–181.
- 23 Charles Tilly, *W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4 同注5，9–10。
- 25 Peter Hedström and Petri Ylikoski,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2010), 52.
- 26 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Free, 1965).
- 27 Alan S. Zuckerman, “Advancing Explan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Social mechanisms, Endogenous Processes, and Empirical Rigo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4.
- 28 Carl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39 (1942), 35–48.
- 29 Carl G. Hempel and Paul Oppenheim,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5 (1948), 135–175.



- 30 Karl Popper,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31 同注8, 9–10。
- 32 Gabriel A. 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437–490.
- 33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34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1999), S158–S183.
- 35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 36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37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8 王紹光, 《民主四講》(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82–83。
- 39 Robert K. Merton and Alice Kitt,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 Behaviour,” in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merican Soldier”*, ed. Robert K. Merton and Paul F. Lazarsfeld (Glencoe: Free, 1950), 40–150.
- 40 Tamotsu Shibutani, “Reference Groups as Perspec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1955), 562–569.
- 41 Dietrich Rueschemeyer, *Usable Theory: Analytical Tools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
- 42 李鈞鵬, 〈行動、動機與自我概念: 兼論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成〉,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一期(2011), 51–52。
- 43 Arthur L. Stinchcombe, “The Conditions of Fruitfulness of Theorizing about Mechanisms in Social Science,”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S. Coleman*, ed. Aage B. Sørensen and Seymour Spilerman (Westport: Praeger, 1993), 23–41.
- 44 同注5。
- 45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Social Mechanism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ed. Peter



-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1.
- 46 同注27。
- 47 Roger V. Gould,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48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9 同注48, 25–26。
- 50 Charles Tilly,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Paradigm, 2005), 26–27.
- 51 同注21, 139。
- 52 Jack A.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53 Cass R. Sunstein,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4 Karen Barkey, *Empires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5 Charles Tilly,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6 同注50。
- 57 Charles Tilly,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8 Larry J. Griffin,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 (1992), 403–427.
- 59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60 同注21, 9。
- 61 James M. Jasper, *Nuclear Politics: Energy and the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2 Sidney Tarrow, “Confessions of a Recovering Structuralist,”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5 (2006), 7–20.
- 63 同注59, 14。
- 64 同注21, 9。
- 65 Sidney Tarrow,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to ‘Local Theory’: The Italian City-State Route to the Modern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33 (2004): 443–471.



- 66 Charles Tilly, "Why and How History Matter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ed. Robert E. Goodin and Charles Til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22–423.
- 67 同注21, 9。
- 68 Richard Franklin Bensel, *Passion and Preference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the 1896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69 Jeffrey C. Goldfarb, *The Politics of Small Things: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Dark Ti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70 同注58, 413。
- 71 同注59, 81–123。
- 72 James Mahoney, *The Legacies of Liberalism: Path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Central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73 同注59, 101。
- 74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2.
- 75 同注21, 136。
- 76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77 John Gerring, "Causal Mechanisms: Yes, But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 (2010), 1499–1526.
- 78 Neil Gross, "A Pragmatist Theory of Social Mechanis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2009): 358–379.
- 79 Peter Hedström and Peter Bear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80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81 同注25。
- 82 Daniel Little,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Boulder: Westview, 1991).
- 83 James Mahoney, "Beyo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Recent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Sociological Forum* 16 (2001), 575–593.
- 84 Daniel Steele, "Social Mechanisms and Causal Infer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2004): 55–78.

